



论《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意蕴^①

方坚伟

摘要:《史记》《汉书》叙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数术叙事传承了《左传》的神秘化特征,是数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客观上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过程中,蕴含了古代数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史记》《汉书》 数术叙事 修辞意蕴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1-0174-06

作者简介:方坚伟,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所谓修辞,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认为:“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1]《史记》《汉书》数术叙事过程中多运用意象性、隐喻性的表达方式,并不直接展现情感或形象世界,在数术文化的影响下,《史记》《汉书》的文学语言多用积极修辞和典型修辞格,表现为象征、隐喻、反讽、比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并且形成了丰富的文学效果。

一、《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积极修辞

积极修辞是相对于消极修辞而言。消极修辞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修辞或弱化修辞,“记述的境界,如科学文字、法令文字及其他的诠释文等,都以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为目的。而要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概况,就须把对象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所以这一方面的修辞总是消极的,总拿明白做它的总目标。”^{[1]53}而积极修辞则是在描述事物的过程中运用修辞格以达到表情达意的生动化与形象化。简言之,消极修辞于内容上是传达简明扼要的信息给接受者,于形式上则是要求质朴,拒绝华丽的变形化的语词;积极修辞恰好相反,使用修辞格的目的在于内容与形式上都希望追求体验式的审美。“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使人感受,却不是这样便可了事,必须使听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1]70}叙事文学是通过故事或事件以传递感受,作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立项编号:GD15CZW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成果(立项编号:2015M58236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年校级科研项目立项资助成果(立项编号:15Q22)。

^①关于“数术叙事”,是指在“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等数术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叙事特点。参见本人拙文《〈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者的目的是要接受者产生共鸣,这是成功叙事的标准,当然这是就虚构叙事来说。

对于史传叙事,由于人物传记的特点,作者必须在真实叙事的前提下将传主的生平事迹、思想性格展示于接受者面前,积极修辞不能仅仅是为体现作者的感情渲泄或语言能力而运用,而应当是服务于人物形象或事迹的张力;而消极修辞的运用,在古代史传中,则更多地体现为《春秋》编年式史实载录。对于数术叙事来说,积极修辞则体现在叙事时修辞的意味。数术叙事由于其神秘文化背景的原因,语言往往不流于空洞乏味,常直接以作用于人的感觉表现出来,相人术、卜占、梦占均属于此类。相人术属于关联性思维方式,多以自然事物的属性与人性的相似处进行类比,故在叙事时总充满了生动形象之感。《国语·晋语》曰:“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覆也,必以贿死。’遂不视。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2]叔鱼出生时,其母亲见其长得虎目猪口、鸢肩牛腹,便认为叔鱼将会因贪婪而致死,叔向之母通过杨食我的哭声如豺狼声从而判断其家族命运的下场,这些实际上是取动物属性类比如于人的脾性。这样的数术叙事,诉诸于视觉、听觉,将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出来,这种积极修辞使人产生具体的联想,富于意味,《史记》《汉书》在进行数术叙事时,也多类此。《汉书·荆燕吴传》曰:

已拜受印,高祖召潏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潏顿首曰:“不敢。”^{[3]1904}

显然,这是刘邦的心理战术,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正如刘邦所担心的上演了。这里,用“独悔”表现了刘邦的内心感受,“拊”的动作把刘邦那种复杂而又担心的心态表露无遗,也说明相人术在汉代的重要地位。再如梦占,主要是对梦境发生事情的形象描述。《史记·龟策列传》曰: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4]3229}

这里通过梦境虚构了人龟对话的情景,宋元王夜梦神龟求救,此处将神龟拟人化,并借助其叙述话语道出了求助于宋元王的原因是由于“王有德义”,而元王对于梦境事物的描述“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乘辎车”,这些都是龟的形象描绘,以拟人的手法表现数术叙事。除此,数术叙事有象征、引语、隐喻等多种典型修辞格。

二、《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典型修辞格

史传数术叙事运用象征手法来表现相关的数术概念或范畴。数术之学并不直接表达意义,而是需要掌握这种文化方法的专门人才,通过解读数术形式所蕴含的深层意思并进行还原,这种深层意思多以象征的方式存在。象征手法的运用往往透露的是司马迁、班固的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反映。梁启超说:“由是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5]相较《史记》而言,《汉书》则个性色彩偏弱,正统观念持正。数术之学,从本质上说是形而上之术,古人运用数术认识并解释宇宙、自然、社会等领域是一类哲学思考方式,司马迁、班固作为官修史家,其目的不但在于实录历史,也通过史实表达个人人生思考,在叙事过程中,数术便以各类修辞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获麟”,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中,“获麟”是以瑞兽的形式象征“仁政”与“王道”。刘向《说苑·至公》曰:“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6]“麟”成了孔子所提倡的政治主张的象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4]509}“麟”为瑞兽,在

古代往往以此预示天下太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曰：“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7]“麟”的出现，实是借此对帝王政治的歌颂与褒扬，象征“王道”始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曰：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 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我道穷矣！”^{[4]1942}

孔子的悲叹，是对王道沦丧的感慨，“麟”在乱世出现，却是意味着不祥的预兆。反之，“麟”出现在盛世，则是一种祥瑞的象征。《汉书·武帝纪》曰：“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3]174}正是这一年获白麟，故改元为“元狩”，可见，“获麟”的政治象征对于王权兴衰的意味是何其重要，尽管“麟”极可能便是现实生活的某一种动物的政治异化，但是在神学化渐浓的武帝时期，这种政治象征对帝国统治无疑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所以，后汉时期这种手段被多次使用。《后汉书·明帝纪》曰：“是岁，溱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8]114}又《后汉书·安帝纪》曰：“冯翊言甘露降频阳、卫。颍川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8]239}可见，两汉以“麟”象征政治开明及兴盛的思想是非常普遍的，这也往往为数术家所采用并进行宣扬，除了这种政治象征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之外，在数术家眼里，“麟”也符合神兽的形象意蕴。

数术叙事的象征修辞还体现在星占之中，星占属天文学，《汉志·数术略》“天文家”小序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3]1765}星占有参政之用，统治者通过星象变化可以反省施政得失，并及时调整政事。日食代表“阴侵阳”，象征凶兆，孔颖达曰：“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9]日食在星占学中是不祥之星象，故古人厌恶日食，代表君臣秩序失常或水祸，认为这些是日食的人事表现。《史记·吕太后本纪》曰：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4]404}

吕后虽不称帝，但有帝王之实，司马迁将之列入本纪，便为此意，然而吕后毕竟自知其行为有违古训，对日食的自然现象出现是不高兴的，故吕后说“此为我”，反映出其性格的刚毅与内心非常人所能及的特点。《史记·孝文本纪》曰：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蓂，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蓂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有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均以告朕。”^{[4]422}

文帝以代王的身份被拥立继祚，其本人对鬼神之事颇是相信，也重视日蚀的警诫意义，由日蚀进而反思其政事的过失之处，并引以为施行新政的动因。这种以日蚀象征政事过失，也在《汉书》中有记载：

《汉书·宣帝纪》曰：“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3]268}

《汉书·元帝纪》曰：“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3]289}

《汉书·元帝纪》曰：“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淹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庠？今此下民，亦孔

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德，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3]291}

《汉书·成帝纪》曰：“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得道，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措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3]307}

从《汉书》载录的史料可得出，西汉的日蚀现象出现得较多，逢日蚀发生，皇帝便会发布诏告，将日蚀与政事施行联系起来对待，这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具体表现。从文学修辞来看，日蚀象征政事缺失，是以自然现象对应社会行为的表现。一方面，这种象征意义蕴含文化意味，日为阳，蚀之为阳侵阳，则为阴阳思想的自然现象具体化；另一方面，日蚀象征帝王自身的德行是否顺应天命，对帝王有警示作用，故下诏以反省。

数术叙事中多以隐喻方式再现事件，作为历史传记而言，史官不可能将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事件全部还原出来，也不可能纯粹写实地表现传主本人及其事件，只能通过部分事件表现整体事件、此事件与彼事件之间的联系。国外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同时也是隐喻性叙述，表明这些事件和过程与我们约定俗成的叙事类型是相似的，这个叙事类型通常用来赋予生活中的事件以文化意义。”^[10]海登·怀特所指的这种历史叙事的隐喻性叙述，揭示的是文化背景是架起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离开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是无法完成文本理解的。以《史记》《汉书》相人叙事为例，是基于汉民族对相人术的共同认识为前提的，其背后的理解原理所采用的就是隐喻修辞，而这种关联性靠的是读者的联想。如龙颜、美须髯、日角、龟背、大目等相人术语聚合在一起，令人想至的便是帝王、富贵之相；而蜂准、螭鸟肩、露眼、豺声，自然便是凶恶面相代表。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螭鸟肩，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3]230}

《汉书·王莽传》曰：

莽为人侈口蹶颡，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黼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3]4124}

如果将以上《史记》《汉书》描写秦始皇、王莽外形的关键词抽离出来，其并没有隐喻的特征，但是，当这些词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一结合便具有了形象化的人物表征。而这种隐喻所依据的认识基础在于人们对于“喻体”的文化认同，相人术多用动植物或图腾综合体来表现人的外貌与命运之间的联系，这种体认方式与汉代谶纬的深入人心的灌输有一定关系。帝王将相的相貌多借用纬书，如前述刘邦为代表的两汉帝王面相的描述，在纬书中就有相对应的刻画。《春秋纬合诚图》曰：“伏羲龙身牛首，渠肩达掖，山准日角，鸱目珠衡，骏毫鬣鼠，龙唇龟齿，长九尺有一寸，望之广，视之专。”^{[11]762}又《孝经援神契》曰：“伏羲大目，山准日角，衡而连珠。”^{[11]964}隐喻的理解就在于文化的同一，数术叙事的数术之学本身就是一类共同的文化体系，所以，在隐喻修辞中，这种文化关联很自然便能达到表情达意的需要。

三、《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艺术特色

（一）叙事寓论断

古代史书常通过预言、占卜、人物对话等方式将结论隐伏于叙事之中，《左传》始用之，而频繁使用这种方式的是《史记》及《汉书》，借助数术之学固有的全知视角特征，将“叙事寓论断”发挥得淋漓尽致。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曰：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国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

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12]

顾炎武认为班固对司马迁“序事中寓论断法”是有继承的，也只有班固领会了司马迁之法，实际上，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具有多样化。白寿彝说：“司马迁‘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年谱及其做法》曰：“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14]《史记》叙事过程中正如梁启超所言，特别是与数术之学相关的历史叙事中，就直接预示了事件结局或判断，《汉书》也是如此。

《史记》《汉书》寓论断于数术叙事之中，通常都是暗合人物的结局或事件的发展趋势，数术作为一种超现实的文化现象，使得《史记》《汉书》的历史叙事前后情节的统一。如《史记·樗里子列传》叙述樗里子的堪舆预言与汉代宫殿选址的一致：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

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4]2310}

由此可见，堪舆在汉代已经得到重视，特别是墓地的选址是经过精心挑选，如韩信卑微之时，仍然要为其母亲选择符合荫蔽子孙的风水之地。《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葬母选址的与众不同：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4]2630}

韩信未显达时，在选择葬母的风水中已经暗合了其志向的远大与日后“可置万家”的成就，淮阴人都认为韩信的发迹与风水有关系，司马迁对于这种说法是肯定的。

《汉书·霍光传》曰：“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

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3]3933}

霍光作为昭帝时期的权臣，《汉书》通过对其相貌的描写，结合其平时进出殿门的动作，将其谨小慎微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霍光所以能权倾朝野的原因则在叙述过程中不言而喻。

《汉书·高帝纪》曰：“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饷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3]5}

《史记》与《汉书》都采信该材料，这更像是民间传言，这种传言入正史纯粹是出于为刘氏皇朝的合法性制造天命依据，但是，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采纳了这个材料，说明当时对于刘邦的这种神化，是出于一种顶层政治设计的需要，并最后为史官所接受并再创造。在这个叙事过程中，实质上已将刘邦获取天下的结论进行了神异化归纳，简直便是小说的手法，这恰是司马迁之能耐所在，从数术叙事中暗含着其思想判断或政治意图。

（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

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曰：“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斯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15]专注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史记》和《汉书》的显著特点，尤其是人物身份与语言的匹配，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适如其人之言”，如刘邦与项羽同样遇见秦始皇出巡盛况，刘邦是“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也！’”^{[4]344}而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之也”^{[4]296}言语之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情，符合刘邦与项羽的出身背景及成长特点。在相人叙事中，往往运用片言只语的外貌形容便能将人

物性格勾勒出来。《汉书·陈平传》曰：

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亲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弃之。及平长，可取妇，富人莫与者，贫者平亦愧之。久之，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丧，平家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之？”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卒与女。^{[3]2038}

按相人术而言，陈平为俊美男子，对张负的女孙的五次亡夫的婚姻毫不畏惧，这是常人婚姻经历中少有的选择，张负坚持将女孙嫁给陈平的理由则是认为像陈平长得如此美男的人，是不可能长久贫困的，定有飞黄腾达之日。可见，汉代时期相信外貌决定一个人的仕途命运。《陈平传》对于陈平的外貌只用了四个字“长大美色”，意味深远，对于读者而言则充满了想象空间。有时，通过人物简要的对话，也就寓示了人物的命运。如蒯通以相人术策反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曰：

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

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4]2623}

汉代相人术在社会各阶层流行，蒯通利用相人之法说服韩信自立平分天下，但是，韩信未采纳蒯通的建议，韩信认为：“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4]2624}蒯通以相人术的“骨法”“容色”引出成败之论，以背为谐音劝其背叛刘邦，巧辩之功力犹见先秦纵横家之遗风。

综上所述，数术叙事作为一种超现实的文学手法，严格来说，这与以真实性为原则的历史叙述是格格不入的，由于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固有特点，数术文化在史传叙事中的渗透，使得叙述人获得了全知的叙述视角，同时，运用相人术、望气术等数术手段在表现人物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意象化特征，这种叙事手段同时也具有象征、隐喻等审美修辞意蕴。从这个角度来说，数术叙事使得汉代史传文学效果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422.
-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之七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18.
- [6]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351.
- [7]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76.
-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杜预.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69.
- [10]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3.
- [11]中村璋八.安居香山.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12]顾炎武.日知录.卷26[M]//天津阁四库全书:第284册·子部·杂家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影印:222.
- [1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81.
-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41.
- [15]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508.